

疫病與救援——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如何救濟大饑荒中的疫病 (1959-1962)

藍威承*

摘要

本文首先概述中國大饑荒（1959–1962）之成因，進一步探討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此次災難的立場與政策反應。本文以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之人道援助行動為切入點，探討饑荒期間疫病擴散情形與國共雙方在災害及救援行動應對上之差異。由於當時中共政府對災情資訊實施嚴格封鎖，導致相關一手史料取得困難，故本文擬透過已出版之專書、報刊資料，對疫病現象進行間接補充與旁證。本文發現，疫病與饑荒同步惡化，常見疾病包括水腫病、痢疾與肺病等，與集體化政策下之營養失調及醫療崩潰相關。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則透過糧食與藥品空投、文宣與國際合作，實施物資援助與心理戰等行動，進行人道救援。此外，特別關注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及救總對大陸災區所實施之人道救援行動，分析其所投放的物資種類與執行策略，從中觀察災區疫病的發生概況與國共雙方對此現象的回應與轉變。

關鍵字：中國大饑荒、三年艱困時期、中國災胞救濟總會、人道救援、饑荒與疫病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二年級

一、前言

1958 年大躍進開始，中國開始全面推行各地「高產衛星」運動，並發動「反右傾」、「反瞞產」等政治鬥爭運動。這一系列措施，再配合中共政府「三面紅旗」¹的人為政策方針下的強力實施，直接導致饑荒爆發，隨之而來的即是饑荒的快速蔓延。而饑荒蔓延的成因，可追溯至農村集體化後的「大躍進」，當中又以生產為目標的帶動下的「高產量」的過程中，所引起各地普遍虛報產量，進而造成對於農民的過度徵購糧食或是用以儲備戰備糧，最終引發全國性的大饑荒。²

隨著大饑荒爆發並迅速蔓延，各地出現大量餓死事件，社會亂象層出不窮，包括啃樹皮、人食人、絕村絕戶等極端亂象。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暴動、叛亂、犯罪增加等情形。³理論上，疫病應隨饑荒出現而同步擴散，然而饑荒現象早在 1958 年以前即出現，⁴至 1960-1962 年間發展至高峰。然而中共政府於此期間對於饑荒與疫病的記載及描述，普遍較為簡略，未見充分揭露其嚴重程度，只能透過相關統計資料及中華民國之報導，略窺一二。

關於大饑荒之相關研究，學界已有相當豐富之成果。例如：馮克《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楊繼繩《墓碑》等為代表性專書，均對饑荒期間之政策制定及歷史脈絡進行深入分析，並揭示中共政府施政下的實際後果，其中亦有提及疫病蔓延與公共衛生之關聯，然而專書大多還是聚焦於中共政府對於政策實行，與整體饑荒之脈絡討論。⁵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則以大饑荒中的廣西為主，進行區域性研究，以反瞞產行動為觀察對象，亦有部分提及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大饑荒中救援所嘗試進行之救援措施；⁶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則是以口述訪談為主的口述史料彙

¹ 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

² 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頁 377。

³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二十一世紀雙月刊》，60（香港，2000），頁 37-40。

⁴ 胡健中，〈廣東廣西兩省，饑荒日漸嚴重〉，《中央日報》，1957 年 6 月 22 日，第 1 版。

⁵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馮克，《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香港：天地圖書，2009）。

⁶ 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2023）。

編，補充大量一手史料，反映普通民眾於饑荒中的真實處境與生存經驗。⁷

期刊論文方面則有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劉兆崑〈中國大饑荒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研究之綜述與解讀〉，則分別從中共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及死亡人口之角度切入，對現有研究進行整合與反思，並歸納死亡原因進行討論，為筆者研究提供資料基礎與方向視角。⁸

整體而言，以上研究提供筆者理解大饑荒歷史脈絡與政策推動過程之基礎，亦成為進一步討論之史料依據。然而，就現行的學術研究，對於疫病層面的探討相對缺乏。多數研究聚焦於饑荒期間中共政府之政策失誤、人為操作所帶來的災難後果以及非正常人口死亡之統計與當時社會變動等議題。至於疫病的相關描述，多僅餘專書章節之小節進行討論，或透過口述訪談中的個人經驗及回憶間接論述，顯示饑荒疫病議題仍具補充與拓展空間。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次年初中國即爆發嚴重天災，人民生活陷入苦難當中。蔣中正總統於 1950 年 3 月 29 日發表廣播，公開呼籲國際社會與海內外同胞共同援助災民。⁹同年 4 月 4 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以下簡稱救總）正式成立，¹⁰並以「以胞愛發揚民族精神，以救濟團結反共力量」為兩大宗旨，希望藉由政府與外界支援捐助，致力推動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對中國大陸災民與海外難僑之援助工作。

救總成立初期，主要任務包括救濟災胞，接運災胞來臺安置與照護，並參與海內外重大災害救助等。隨後，隨著中共政府於 1958 年起推動「大躍進」政策並引發大饑荒，救總之救援行動亦隨之增強與擴展。¹¹至 1987 年兩岸開放交流及社會環境變遷之後，逐漸轉型為以關懷在臺陸配、推展泰緬地區華文教育、偏鄉社區服務、災害及人道援助、促進兩岸交流及社會福利政策為任務之民間組織。

⁷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美國：明鏡出版社，2013。

⁸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頁 37-40。；劉兆崑，〈中國大饑荒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研究之綜述與解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網路版》，77（香港，2008），頁 1-10。

⁹ 葛雨琴，《救總六十：中華救助總會籌立 60 周年專輯》（臺北：中華救助總會，2010），頁 12-15。

¹⁰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創立於民國 9 年（1950）4 月 4 日；民國 80 年（1991）更名為「中國災胞救助總會」；民國 89 年（2000）更名為中華救助總會。

¹¹ 中央社訊，〈大陸救災總會，招待泰記者團〉，《聯合報》，1952 年 1 月 6 日，第 01 版。

筆者注意到國民黨及救總，對於中共政府實施的「三面紅旗」政策持強烈的批判立場，尤其針對大饑荒之前因後果。¹³1960-1961年為大饑荒之高峰期，然而除饑荒之外，自1960年後對於疫病蔓延之報導亦逐漸增加，直至1962年後饑荒情勢趨緩後才有所減少。基於上述背景，本文將年代界定於1959-1962年間，大饑荒最為嚴重之階段，並擬從下列三個層面進行分析：首先，探討中共政府施政下，大饑荒與疫病之傳播情形；其次，檢視中華民國政府與救總對該段期間疫病與災情之認知與論述；最後，分析救總於援助大陸災胞過程中，對於疫病問題所採取之救濟行動與實務作法。

初步研究先由相關專書及期刊論文為基礎，釐清大饑荒期間疫病流行之概況梳理，進而運用救總之救援行動、統計與報導史料進行分析，嘗試窺探中華民國對於中共政府在大饑荒中，所扮演之角色與其對疫病災情之應對方式。

二、大饑荒下的疫病問題

1958年前後，中國部分地區出現糧荒與疫病徵兆，顯示地方糧食供應與公共衛生體系已出現危機。大躍進推行後，饑荒與傳染病迅速蔓延，至1959-1961年間達到高峰，常見病症如水腫病、肺病與肝病，死亡人數大幅上升。中共政府一方面封鎖訊息、淡化災情，另一方面直至1961年起，開始採取有限補救措施。至1962年後，相關報導日漸減少，災情逐漸被政治宣傳所掩蓋。本文擬透過中央日報與救總統計資料，探討大饑荒期間疫病傳播的議題。

（一）擴散與封鎖

中共政府自1958年起全面推動大躍進後，由於各地為追求高生產及虛報產量下，各地糧食供應逐漸出現斷層，各地饑荒開始爆發。¹⁴隨著饑荒擴大，民眾開始尋找一切能入口的食物，燒殺擄掠等行為在當時可以說是習以為常，加上反右傾、反瞞產運動，更造成能夠向上通報的通道完全封鎖，社會秩序逐漸失控。

¹² 中華救助總會，〈本會簡介〉，<https://reurl.cc/NYxMop>，擷取日期：2025年4月14日。

¹³ 胡健中，〈共匪走向敗亡三部曲：下〉，《中央日報》，1959年9月19日，第6版。

¹⁴ 王力堅，《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頁377。

¹⁵而中共政府目前將大饑荒之主因歸咎於天災所導致。¹⁶

上述背景下，饑荒與疾病呈現同步惡化的趨勢，常見疾病包括：浮腫病、腹瀉、痢疾、發燒、傷寒及營養不良所致之其他疾病等。中共政府雖有進行防治，例如：玉林縣推行水腫病防治、博白縣實施「抓四病」等措施，但整體而言，疾病幾乎遍及各主要災區，規模甚廣。¹⁷針對饑荒期間疫病蔓延的現象，現行研究大致歸納出數個重要特徵：第一，疫病的發生與集體化政策有高度關聯，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人民公社制度使人口高度集中、加上營養不良與惡劣的衛生環境，理當構成傳染病傳播的溫床；第二，農村基層醫療系統在饑荒期間近乎全面崩潰，醫療人力與物資極度匱乏，使得農村對於疾病突發缺乏基本的應對能力；第三，中共政府對疫情資訊實施嚴格的封鎖與管制，對外宣傳與內部統計數據經常脫節，使得外界難以掌握實際情況。¹⁸綜上所述，饑荒與疫病之擴散並非單一自然因素所致，而是在政治高壓與醫療制度失能下，所導致之人為現象，並非所謂的自然災害所致。

在筆者所閱讀之口述回憶及報導當中，亦可見饑荒與疫病關之相關紀錄，例如：「好好個人，說沒就沒了，人不敢說是餓死的，人民公社餓死人，新社會餓死人，你想受法阿？」¹⁹顯示出災民因言論封鎖而無法揭露真相及政府嚴格執行人民公社之制度；「人吃不上飯，啥怪病就來了，又沒錢看，山溝溝裡哪裡找個大夫去？人就沒了……咽不下去，拉不出來，先是瘦了，瘦成麻桿桿子了，後來浮腫了，身上到處……」²⁰；「死了沒人埋，就把那人死在河灘裡，三月間死的人，八月間還在河灘裡，常常得睡在那，人都臭了，蛆生滿了，蒼蠅飛滿了，沒人埋。」²¹則顯示出地方醫療功能癱瘓、基礎公共衛生全面崩潰的情況。

¹⁵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 963。；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頁 173-178。

¹⁶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二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62），頁 15-16。

¹⁷ 所謂四病意指「浮腫、乾瘦、婦女子宮下垂、閉經」。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頁 287。

¹⁸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頁 311-324。

¹⁹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頁 65。

²⁰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頁 57。

²¹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頁 83。

透過上述紀錄側面佐證，1959-1962 年間的大饑荒之概況。首先，此時期中共政府對於資訊實施封鎖與管控；其次，偏遠農村地區的醫療設備與技術水準仍極為落後，無法有效應對大規模的傳染病流行；最後，糧食嚴重短缺使得眾多民眾尚未染病即因飢餓死亡，疫病在多數情況下可能為「次要死因」。

綜上所述，在中共政府「鐵幕」的封閉控制下，當時的傳染病發病率官方記錄反而異常偏低，加上醫療統計資料的可信度備受質疑，其結果大多都指向由「天災害為主，政策為輔」的巧合因素下，導致人民非正常死亡。²²

（二）失控及掌握

根據中央日報的報導，早在大躍進全面實施前，中國部分區域就已出現饑荒的徵兆。1957 年 6 月 22 日報導指出，廣東、廣西地區爆發饑荒，民眾缺乏糧食，開始出現餓死的現象。²³反映早在大躍進之前，地方糧食供應體系已經出現危機。1959 年 1 月 26 日，關於疫病的報導描述，更針對因集體化政策的人民公社食堂，導致被迫密度的聚集，指使疫病逐漸蔓延。常見的疾病例如：砂眼、肺結核、性病、腹瀉、麻症等，並強調中國地區疾病的爆發與醫療體系與資源的匱乏有直接關係。²⁴

1960 年後，報導對饑荒與疫病的記載更為密集。8 月 22 日指出，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導致浮腫病等「饑餓疾病」盛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²⁵11 月 22 日則描述中共統治區糧荒持續惡化，因缺糧導致浮腫、餓病、餓死，乃至於殺人劫糧等社會亂象。²⁶與此同時，中共政權除縮減糧食配給外，亦逐步以政治宣傳掩蓋實況，報導中對「暴政」的批判開始增加。²⁷

1961 年，大饑荒達到高峰，報章幾乎連日出現關於餓死與疫病的消息。其中，1 月 29 日，引述香港的難民證言，疫情已經有所擴散的跡象。²⁸2 月 1 日報導除提及疫病的水腫病等疫病之外，更透露中共試圖將「餓病」偽造成血吸蟲病，

²²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民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頁 98。

²³ 胡健中，〈廣東廣西兩省，饑荒日漸嚴重〉，第 1 版。

²⁴ 胡健中，〈公社暴政下的匪區怪現狀〉，《中央日報》，1959 年 1 月 26 日，第 6 版。

²⁵ 胡健中，〈大陸人民不如牛馬，衣不蔽體十部果腹〉，《中央日報》，1960 年 8 月 4 日，第 1 版。

²⁶ 胡健中，〈大陸饑荒空前嚴重〉，《中央日報》，1960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²⁷ 胡健中，〈大陸饑荒情形嚴重，受災災民兩億有餘〉，《中央日報》，1961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²⁸ 胡健中，〈大陸饑荒情勢嚴重，五億農民普遍不滿〉，《中央日報》，1961 年 1 月 29 日，第 2 版。

以掩飾因饑荒所致的實際死亡原因。²⁹2月3日之報導，則大致總結了中國地區的染疫情形，指出最普遍者為因饑餓導致之水腫病，此外尚包括肝炎、胃病、貧血、肺病與眼疾，發病者遍及各年齡層，其中青年學生尤為嚴重。³⁰報導訪談中指出：

「在我周圍的同學，健康情況是不令人滿意的，一些同學在短短一年中就患上了肝病、肺病、有的已休學，有的在隔離中，湖北有些大學還有相當部分的學生患有水腫病。……」³¹

可見中國地區饑荒與疾病傳播相當廣泛。中華民國也藉由對照臺灣「飽暖安康」與中國「饑寒交迫」的處境，作為意識形態上的政治宣傳。³²此外，此時期的報導除了關注醫療藥物、營養失調，亦開始出現關於精神病之相關報導。據報導統計，截至1961年底。中國地區至少有6500萬人罹患水腫病與其他疾病，神經衰弱、麻痺病數量也逐漸增加，婦女則是出現停經及子宮下垂等疫病。此外，如誤食毒物、過度勞累導致死亡者，更是難以估計。³³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共政府封鎖外界支援，醫療器材、藥物難以進入內地，迫使民眾需用民間療法用以醫治疾病，如廣州醫院推廣使用草藥製病；山西結合土洋法³⁴展開撲滅病毒的工作。

35

1961年初起，情勢略有改變。中共政府開始大量進口糧食，同時對於饑荒所引起的疾病進行集中治療與救濟，饑荒與疫病問題遂有趨緩之跡象。³⁶例如：福建省於1959-1961年間，罹患「四病」者計98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2萬人，缺糧人口約逾千萬，占農村總人口80%以上。³⁷中央遂開始派遣醫療團隊、設立營養食堂，³⁸並於廣西等地減少糧食徵購、增加補給，甚至發展以瓜菜代糧、小

²⁹ 胡健中，〈大陸饑荒情形嚴重，受災民兩億有餘〉，《中央日報》，1961年2月1日，第2版。

³⁰ 胡健中，〈匪區來函痛述饑荒慘狀〉，《中央日報》，1961年2月3日，第2版。

³¹ 胡健中，〈匪區來函痛述饑荒慘狀〉，《中央日報》，第2版。

³² 胡健中，〈饑寒與保暖—大陸和臺灣生活的對照〉，《中央日報》，1961年2月10日，第2版。

³³ 胡健中，〈饑荒繼續蔓延下，大陸充滿悲劇〉，《中央日報》，1961年6月24日，第2版。

³⁴ 筆者推測應該是意旨，民間療法配合西方醫學的簡稱。

³⁵ 胡健中，〈大陸疫癘普遍蔓延〉，《中央日報》，1961年2月21日，第2版。

³⁶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頁43。

³⁷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民政志》，頁98。

³⁸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民政志》，頁93。

球藻養殖與代食品生產等措施以穩定局勢。³⁹至 1962 年後，關於饑荒與疫病報導數量明顯下降，相關報導記載逐漸轉向政治性宣傳用途，而非純粹報導災情現況。

綜上所述，1958 年前後，中國部分地區即出現糧荒與疫病徵兆。大躍進實施後，饑荒與疾病迅速擴散，1959-1961 年間達到高峰，常見病症包括水腫病、肺病與肝病，死亡人數激增。中共政府一方面封鎖訊息、掩飾災情，另一方面遲至 1961 年始採取進口糧食與設置營養食堂等補救措施。至 1962 年後，相關報導逐漸減少，災情被政治宣傳取代。

三、救總的人道救援

救總從 1950 年初成立以來，就開始對中國地區進行人道救援工作，然而救濟行動雖已非政治宣傳為目的，但實際上，宣傳手段其實一直在持續進行。而在執行人道援助的過程中，其救援內容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轉變。初期援助以糧食為主政宣為輔，但隨著饑荒逐漸嚴重，援助重點由前者逐漸轉向涵蓋糧食與醫療的「糧醫救濟」。這種轉變不僅反映在援助策略上的調整，也可從當時新聞報導與官方宣傳中窺見其脈絡，說明救援行動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上的多重意涵。

(一) 救援行動

救總成立後，即開始進行救災工作。1957 年夏季至 10 月間，⁴⁰救總為配合空軍執行空投救濟任務，出動 C-46 運輸機對中國大陸災區進行糧食、衣物及傳單之空投。傳單內容除傳達援助訊息外，亦大量運用政治標語，如「反攻復國、光復大陸、還我山河」，顯示救援行動與心理戰宣傳密不可分。⁴¹1958 年救總統計執行空投任務共計 16 次，內容物也與前一年略同，且更著重於宣傳臺灣「作物豐收」、「反共成果」等內容，並採用彩色印刷以提升傳播效果。同時改良空投技術，增進救濟效率。⁴²傳單文案強調：

³⁹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民政志》（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08-109。

⁴⁰ 10 月這次空頭行動，遇蔣總統 70 華誕，政治宣傳意味更加濃厚。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七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57），頁 2。

⁴¹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七年》，頁 2。

⁴²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八年》（臺北市：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58），頁 1-2。

臺灣在蔣總統的賢明領導的民主政治下，連年穀物豐收，人民生活，舒適安定。想到大陸同胞欲炊無米，忍飢挨餓...我們空投物資，千里鵝毛，聊表還難與共的情意.....」⁴³

可見此時援助與政治宣傳的雙重執行。

1959年6月30日，救總進一步籌備大量救濟物資，包括：糧食、衣物、藥品希望試圖透過容紅十字教會等國際組織進行救濟行動。⁴⁴ 1961年1月30日，蔣中正總統演講中提到「一人一元」的行動，將饑荒成因歸咎於中共政府之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並呼籲援助行動應以人道立場出發，確保物資能直接送達饑民手中。其援助行動強調三點原則：第一，不採取軍事手段介入災區；第二，呼籲各國停止協助中國糧食出口；第三，嘗試與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共同施援，並強調「不惜代價」將物資輸入中國。儘管中華民國政府曾派遣運輸機空投物資，但因共軍對空防禦與災情分布廣泛，實際效果有限，風險極高。⁴⁵

值得注意的是，雖援助名義多由民間發起，然實際操作大多由政府統籌規劃，再由「人民團體」（例如救總）等執行，形成名為民間、實為國家操控之救援模式。⁴⁶ 1961年2月1日，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下稱中常會）第274次會議由陳儀主持，⁴⁷明文：

故在目前第一階段之工作，應當充分表現其為純粹的救濟性質，不具任何政治作用。但自應在宣傳上相機反應共匪之所謂強大進步及統治鞏固，均屬炫夸之詞，以不公自破.....⁴⁸

表明大陸地區災胞的救援辦法，表明援助行動「應充分表現其為純粹的救濟

⁴³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八年：附錄》，頁7。

⁴⁴ 正氣中華，〈救總準備大批物資，救濟大陸災胞〉，《正氣中華》，1959年6月30日，發刊號：3714，第1版。

⁴⁵ 本報訊，〈總統關懷大陸饑荒 號召進行有效救濟〉，《聯合報》，1961年1月31日，第1版。

⁴⁶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中國大饑荒期間，蔣中正總統號召全國「一人一元」捐款救濟，國民黨議定「擴大救濟大陸饑餓同胞推行辦法」、「捐款絕不移作其他用途」交行政院各部會與救總執行（1961.2.1、1961.2.2）〉，<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302>，擷取日期：2025年4月14日。

⁴⁷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十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37-006。

⁴⁸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十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37-006。

性質，不具任何政治作用」，但亦強調宣傳層面應針對中共所標榜之「強大與進步」進行揭露與反制。可見在實務上，救援與政治目的始終一同執行。

此期間救總試圖強化國際合作，擴展援助行動。除了回顧先前與紅十字會合作經驗，更盼望可與國際共同合作外。⁴⁹1961年1月22日，希望擴大空投救濟物資至大陸地區，幫助災胞。⁵⁰4月4日，救總舉辦第十一屆會員大會，將拯救中國地區災胞為中心議題，使救援工作需更加積極施行。⁵¹

綜上所述，救總在大饑荒期間，展現出以人道救濟為名，結合政治宣傳、心理戰與外交操作的多重目標。其空投策略與傳單內容不僅旨在紓解民困，更意圖對中共政權之合法性與治理能力進行挑戰，體現出此時期「人道援助」與「政治動員」之高度互動。

(二)救援成果

早期救總執行的救濟物資投送行動，主要仰賴中華民國空軍出動軍機直接空投，隨著中共防空火力逐漸提升，空投任務的風險亦日益升高，軍機進入大陸空域多次遭遇阻撓與攻擊。⁵²基於安全考量，後來都以空飄氣球為主、空投為輔的方式進行。所使用氣球為長方形白色塑膠袋，分為高空與中空兩種。高空氣球體積達400立方英尺，載重約1730公克，可飄至約四萬英尺；中空氣球則為250立方公尺，載重達4763公克，飛行高度約為一萬英尺。兩者飄浮時間皆可超過20小時，平均時速約54哩，能覆蓋華中、華南等災區。汽球利用純酒精及計時表等裝置設定時間爆破，讓物資藥品借由小型降落傘降落至地上，供對岸人民使用。⁵³此外，救總也針對空投方式進行包裝改良，例如於空投物資上加裝降落傘，以保護運送過程中的完整性，並延長食品保存時效，顯示出對救援科技細節的逐

⁴⁹ 臺灣民聲日報，〈救總準備大量物質，電請國際轉送大陸〉，《臺灣民聲日報》，1959年6月30日，發刊號：4999，第1版。

⁵⁰ 胡健中，〈擴大揭露共匪暴行，空投救濟大陸災胞〉，《中央日報》，1961年1月22日，第5版。

⁵¹ 本報訊，〈救總今開會員大會 擴大救濟饑胞 列為中心議題 總統頒訓詞·副總統蒞會致詞〉，《聯合報》，1961年4月4日，第1版。

⁵² 本報訊，〈總統關懷大陸饑荒，號召進行有效救濟〉，第1版。

⁵³ 幼獅社訊、本報訊，〈救濟難胞開始空飄，大批糧藥送往大陸，雷達觀察氣球遠屆漢口，救總昨在台北舉行長風演習〉，第01版。

步重視與優化。⁵⁴

1950-1957 年間共計救濟 32 次，投送物資涵蓋食米、日用品、大量傳單，投送規模逐年擴大。⁵⁵每包口糧袋重約三分之一公斤，以玻璃紙包裝，外印「隨撿隨吃」四字，外層再以印有國旗圖案之粗麻袋包裹。其內容物品類豐富，包括餅乾、麵粉、鴨蛋、砂糖、煉豬油、脫脂奶粉、豬肉乾、香腸、五香粉、鮭魚乾、水果糖等。由此可見，早期空投以「糧食援助」為主體，兼具政治宣傳與實際救濟功能。⁵⁶

然而，1959 年後中國地區大饑荒開始流行，報導頻繁出現饑荒及疫病蔓延之消息，救總遂相應調整救濟重點，強調除糧食援助外，亦須提供醫藥品，並積極籌劃醫療團隊前往災區進行人道救助。⁵⁷例如：民生日報上提到救總備妥 10 萬救災口袋糧，然因行動須隱密，空投路線與地點等細節並未公開說明。⁵⁸

1961 年 2 月 12 日，提及閩北建陽、崇安、永吉、松溪等縣市爆發出現了白喉、痢疾、腸熱、高熱病等傳染疾病，並因醫藥的缺乏，難以控制疫情，疾病迅速蔓延至周邊地區。⁵⁹至下半年，空投物資中開始出現基本藥品，反映政策轉向的初步實施。9 月 8 日，中華民國政府於總統府舉行「長風演習」，對外展示空飄救助大陸同胞的操作流程與內容，此時除投放糧食，藥品如濟眾水、八卦丹、萬金油、百花油等。⁶⁰

援助行動的頻次亦隨災情推移而變動。至 1958-1961 年間共計 108 次，此時為大饑荒時期，證明期間救援行動最為頻繁，反映出饑荒與疫病相對趨緩後，救

⁵⁴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二年》，頁 22。

⁵⁵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八年》，頁 2。

⁵⁶ 本報訊，〈救總趕裝十萬包口糧，春節以前空投大陸，谷正綱昨分析救濟大陸饑荒工作情形，稱將繼續設法促匪開放港口〉，《聯合報》，1961 年 2 月 12 日，第 01 版。

⁵⁷ 胡健中，〈大陸饑荒情形嚴重，受災災民兩億有餘〉，第 2 版。

⁵⁸ 臺灣民聲日報，〈十萬個救災口糧袋正向大陸進行空投〉，《臺灣民聲日報》，1961 年 2 月 12 日，發刊號：4888，第 1 版。

⁵⁹ 本報訊，〈閩省瘟疫猖獗，死亡逾十六萬，匪蔑視饑荒運米銷澳門〉，《聯合報》，1961 年 2 月 12 日，第 01 版。

⁶⁰ 幼獅社訊、本報訊，〈救濟難胞開始空飄，大批糧藥送往大陸，雷達觀察氣球遠屆漢口，救總昨在台北舉行長風演習〉，《聯合報》，1961 年 9 月 9 日，第 01 版。

援頻率之調整。⁶¹

表 2-1：1950-1957 年空投大陸救濟物資一覽表

年份	次數	空投物品		
		食米（公斤）	日用品（份）	傳單（萬份）
1950	7	180,900	-	390
1951	1	30,000	-	50
1952	-	-	-	-
1953	1	30,000	-	400
1954	2	50,000	-	850
4955	3	56,500	15,000	700
1956	2	48,100	22,997	1,000
1957	16	52,970	31,200	1,639
總計	32	448,470	69,197	5,029

參考來源：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八年》，頁 2。

表 2-2：1950-1961 年空投救濟次數統計一覽表

年別	次數	空投物品		
		食米（噸）	救濟物品（包）	慰問書（份）
1950-1961	140	4,627	259,708	194,560,000

參考來源：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二年》，頁 22。

說明：救濟物品統計包含口糧、日用品、藥品。

綜上所述，救總自 1959-1962 年間之援助演變，雖早期亦提及藥品，然援助重心始終以糧食與政治宣傳為主。1958-1960 年間，空投與空飄技術日益成熟，運送效率與宣傳手段皆更為多樣。至 1961 年，蔣中正總統提出「一人一元」募捐行動，明確將大陸饑荒與疫病歸咎於中共政府之政策失誤，並強調援助應以非

⁶¹ 依照表 2-1 及 2-2 推算。

軍事方式進行，從人道出發協助災民。此後，救援物資逐步擴展至醫療用品與藥品，顯示出對饑荒引發疫病問題的高度關注。至 1961 年下半年，救援內容不僅包括糧食與醫藥，更針對特定地區疫病進行定向投放，體現救總從單一糧食救濟，邁向「糧食與醫療」同步的人道援助策略轉變。

（三）國共的應對

由上述段落可得知，救總在饑荒期間對於中共政府所實施相當之多的人道救援及國際社會上的呼籲。然而，中共政府對於其行動的態度如何？國際社會上的反應？現行的研究與資料中，較難取得關於中共政府及人民是否接收到這些救濟物資，故本節擬透過報刊雜誌及大陸地區之省志等，側面反映當時情況。

1. 反革命標語、物品、宣傳之反制

中共政府方面卻愈加強管制手段及控制民眾對於物資上的取得。1957-1958 年間，類似反動標語及傳單，至少增加 10 倍有餘，惟經過各地公安機關的取締偵破，1959 年後的案發率及下降 40.75%，可見中共政府對於其行動的重視。⁶²可見中共政府對於中華民國所推動之救濟與宣傳行動，始終抱持高度敵意與警戒。凡屬自臺灣投放之救濟物資與宣傳品，皆被中共當局視為「反革命行為」、「破壞騷擾」等政治挑釁，並加強境內對此類物品的管制及反制宣傳。⁶³

廣西地區就提及除國民黨特務外，也有部分反革命分子採取書寫、張貼、散播、投寄反革命傳單及標語等行動。1962 年後，中華民國開始試圖以軍事行動進行反攻大陸，以上宣傳行動又再次增多，惟此時較不注重於饑荒上，而是對於中共政府政權及施政上進行批判。⁶⁴然而，省志並未詳細說明 1959-1961 年間之情況，筆者擬透過相關報導用來側面佐證。

若稍加注意 1958-1961 年間，中華民國方面之報導，可發現此期間除先前提及對於饑荒、疫病之外，對於中共政府之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之相關報導甚多，主題大多專指中共政權、制度、反共革命、民生生活等方面進行描述。⁶⁵而救濟

⁶²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民政志》，頁 267-268。

⁶³ 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頁 393。

⁶⁴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民政志》，頁 267。

⁶⁵ 本報訊，〈必須摧毀匪偽政權〉，《聯合報》，1961 年 4 月 5 日，第 1 版；本報訊，〈大陸匪幫的大倒退〉，《聯合報》，1961 年 6 月 12 日，第 2 版。

方面，則是呼籲國際社會對於大陸地區災民進行援助行動，並持續進行空投、空飄救濟工作。⁶⁶1962年後，關於反攻大陸、美國援助反攻行動、國軍反攻等相關報導大量增加，而饑荒之描述多半夾雜於內容當中，用以強化中共政府之衰敗統治失利之論述。⁶⁷

然而，中共政府方面則是更加強力進行此類行動的偵查及取締，並聯合民眾及公安進行有系統性的偵查、分析與逮捕。由於上述嚴格的執行，造成此類反動分子大多受到嚴重打擊。⁶⁸

由此可知，國共雙方在此種行動中的反應呈現兩極化，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持續投入救濟工作的同時，又加以心理戰的方式進行宣傳報導；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則是利用公安及民眾，對於此類行動加強管制與取締。

2. 國際情勢上的呼籲與回絕

中華民國在大饑荒期間除自身進行多次救濟行動之外，在國際社會上有呼籲各國進行援助，然而中共政府多次表明完全相反的立場與態度。1959年7月27日，中共紅十字明確拒絕救總所提供之人道救援，聲稱「無須外界協助」，表現出對國際援助立場的排拒與否定。⁶⁹例如：海南地區曾發現約4萬份國民黨所空頭的傳單，大多被立即銷毀。⁷⁰1961年2月9日，救總懇請國際紅十字會對中共政府交涉，要求開放港口有利救濟物資進入中國，但至2月22日中共紅十字會仍堅持否認饑荒存在，回覆道：「中國大陸從來未有饑荒，亦並未呼籲援助，以解除謠傳嚴重缺乏糧食。」此後，當國際紅十字會詢問中國是否需要救濟支援，中共則回覆：「雖然在過去兩年中，鄉村曾遭受嚴重天災，但從未發生饑荒」，並提到：「我國決能克服這些由於天災所造成的臨時困難。」⁷¹而中華民國則是強烈

⁶⁶ 中央社馬尼拉八日專電，〈呼籲自由世界人士 援救中國大陸飢民〉，《聯合報》，1961年3月9日，第2版；中央社東京十九日專電，〈保證努力勸募 救濟大陸災民〉，《聯合報》，1961年3月20日，第2版；本報訊，〈拯救大陸 饑瘡災胞〉，《聯合報》，1961年8月23日，第2版。

⁶⁷ 曹德宣，〈美國能否助我反攻？〉，《聯合報》，1962年3月27日，第2版；中央社舊金山十一日專電，〈端賴國軍反攻〉，《聯合報》，1962年4月13日，第1版。

⁶⁸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民政志》，頁268。

⁶⁹ 胡健中，〈國際紅十字會通知我國空投救濟大陸災胞又被共匪悍然拒絕〉，《中央日報》，1959年7月27日，第1版。

⁷⁰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頁253。

⁷¹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二年》，頁15-16。

譴責這種行為，2月25日救總理事長谷正綱指責中共政府對於中國地區發生饑荒棄於不顧並掩蓋爆發饑荒之事實。⁷²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方面對於自身實施之人道援助行動持高度評價並積極透過媒體與展覽加以宣揚，塑造其正當性。例如：深入大陸地區投遞傳單、空投賀卡等選宣傳手段、⁷³物資及藥品上的人道救援也未停止。⁷⁴1962年1月23日，於臺北市舉辦大陸災荒資料展覽，主要為響應先前一人一元救災運動，並展出相關照片，而救總則展出對於中國所實施的救援統計圖表，共計140多次，空投食米4627噸；日用品及口糧25萬餘份；傳單1億8千萬餘份等。⁷⁵

換言之，救總在救濟上的積極，雖說其目的並未不是為了政治宣傳，而是只專注在救援行動上，但就傳單數量，其目的不言而喻。直到1962年後饑荒趨緩，對於疫病上的報導逐漸下滑外，國共兩黨對於報導上也逐漸專心於如何防範對方政治上的策反與應對。⁷⁶

四、結語

筆者本文主要討論中國大饑荒中的疫病與人道救援問題，雖然只是一部分的初探，但文中所利用的中華民國的新聞報導與救總的救援行動，可從旁推測饑荒中疫病的發生狀況，並結合現行學術界中所提到饑荒中的疫病作為另一種思路。

筆者初探下，中華民國政府在1959-1961年間大饑荒最為嚴峻的時期之支援物資與報導的內容，可見對於疫病的重視程度逐漸增加，疫情狀況相當嚴重。而救總的在分析報導時，內容中雖有許多激烈的用詞，如：偽政府、敗亡、共匪....等，富有相當明顯的官方偏頗用詞，也可另做延伸討論，但對於饑荒與疫病一同出現的比例相當高，直到饑荒趨緩後，才有所轉向。

另外，對於上述報導中所論之疫病數量統計抱有懷疑，但本文並未糾結於帳

⁷² 本報訊，〈匪悍拒同情救濟，掩飾罪行說無饑荒，谷正綱嚴予斥責〉，《聯合報》，1961年2月25日，第01版。

⁷³ 王力堅，《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頁391-392。

⁷⁴ 本報訊，〈救總趕裝十萬包口糧 春節以前空投大陸，谷正綱昨分析救濟大陸饑荒工作情形，稱將繼續設法促匪開放港口〉，第01版。

⁷⁵ 胡健中，〈大陸災荒資料，今起展覽六天〉，《中央日報》，1962年1月23日，第3版。

⁷⁶ 王力堅，《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頁391-394。

面數字之上，故不多做討論。總結國共兩岸對於饑荒中疫病與救援的反應，可見救總所實施的救援，中共政府當局抱持著一種懷疑和反抗的心態，但中華民國政府也「透過」救總來實施「非政治」上的「人道」救援。最後筆者在閱讀這些史料、專書及報刊所表達的內容，到頭來最痛苦的依舊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普通民眾們。

參考資料

一、史料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十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37-006。

《中央日報 1958-1962》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聯合報 1958-1962》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七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57。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八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58。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二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62。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編，《救濟年報·第十五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65。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民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民政志》，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二、專書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

王力堅，《國家 VS 農民：廣西大饑荒》，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2023。

依娃，《》，美國：明鏡出版社，2013。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香港：天地圖書，2009

葛雨琴，《救總六十：中華救助總會籌立 60 周年專輯》，臺北：中華救助總會，2010。

三、期刊論文

李若建，〈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二十一世紀雙月刊》，60（香港，2000），頁 37-46。

劉兆崑，〈中國大饑荒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研究之綜述與解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網路版》，77（香港，2008），頁 1-10。

四、網路資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中國大饑荒期間 蔣中正總統號召全國「一人一元」捐款救濟 國民黨議定「擴大救濟大陸饑餓同胞推行辦法」、「捐款絕不移作其他用途」 交行政院各部會與救總執行（1961.2.1、1961.2.2）〉，<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302>，擷取日期：2025 年 4 月 14 日。

中國災胞救助總會，〈中華救助總會數位資料庫〉，<https://da.lib.nccu.edu.tw/dp-6.html>，擷取日期：2025 年 5 月 5 日。

中華救助總會，〈本會簡介〉，<https://reurl.cc/NYxMop>，擷取日期：2025 年 4 月 14 日。